

人的靈魂與意識的真實；「內因果」是小說在故事與人物的進程中，依靠「內真實」推動人物與情節變化的原因與結果，它不在現實生活中必然發生或可能發生，卻在精神與靈魂上真實存在。參見閻連科：《發現小說》，頁152、157-58），要與寓

言、神話劃清界限，因後者仍處於「外因果」（指外部世界〔社會、環境及他人〕的因素）的「套穴」之中（閻連科：《發現小說》，頁172-74）。「孩子」這個人物難道真的能跟寓言、神話劃清界限？這還是值得閻連科和研究者深入思考的一個問題。

隱去「黨史」的政治傳記

● 葉蔭聰

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被內地各界如此看重，唯一的解釋大概是作者在東亞研究中的名氣。這本傳記給筆者第一感覺是，資料如此之多，細節如此豐富，但帶來的新認識卻如此之少。



傅高義 (Ezra F. Vogel) 著，馮克利譯：《鄧小平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

筆者一直不太明白為何中國大陸讀者對傅高義 (Ezra F. Vogel) 的《鄧小平時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引用

只註頁碼) 一書如此重視。2012年6月香港各大書店都以此書吸引內地旅客；據說，中國大陸還會推出稍加刪節的版本。傅高義在書的開首其實已明言，這本書主要是寫給美國人或所謂「西方讀者」看的，而非中國讀者（頁xi）。事實上，因為鄧小平對當今中國「政統」的重要性，有關他的論著本已是汗牛充棟。在筆者任教的香港嶺南大學，圖書館雖然較小，但討論鄧小平的著作也放滿了兩個書架，黨史專家、報告文學家、官方理論家也寫過林林總總的傳記作品。過去幾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亦編輯出版了《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和《鄧小平年譜：1904-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若考慮到國內受到官方理論及審查限制，以致相關傳記作品流於宣傳及討論不夠全面，海外也有不少屬禁書之列的作品可供選擇。

篇幅與《鄧小平時代》相若的可能。是香港作家韓文甫(筆名寒山碧)在1990年代出版的《鄧小平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差不多同一時期,阮銘也出版了《鄧小平帝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2),不過只從1976年寫到1989年。稍晚一點,鄭義在1996年出版了《鄧小平傳》(香港:明報出版社,1996)。至於英文著作,較重要的包括前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Richard Evans)的《鄧小平與現代中國的塑造》(*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3; New York: Viking, 1993])一書,台北希代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別於1994和1996年出版中文版。澳洲政治學者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於1994年出版的《鄧小平政治評傳》(*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較重視鄧與中共政治的權力關係,中文版於翌年便由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翻譯過來。而在中國大陸成長、曾經歷過文革、1980年代初赴美的歷史學者楊炳章,於1998年出版了《小平大傳,1904-1997》(Benjamin Yang, *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此書中文版2004年在香港由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被內地各界如此看重,唯一的解釋大概是作者在東亞研究中的名氣。他寫過《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也寫過高度讚許中國經濟改革的書。這本傳記

給筆者第一感覺是,資料如此之多,細節如此豐富,但帶來的新認識卻如此之少。此書除了觸及一些國內言論審查的禁區,例如1970年代末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和1989年民運期間鄧小平的角色,實在無法看到傅對鄧的評價與官方作品有多少出入。傅在書中各處已明言,鄧改善眾多中國人的生活,沒有其他二十世紀的領袖比他做得更多(頁615),他完成了一百五十年來中國領導人沒有完成的使命,找到富國強兵之路(頁12、619)。

鄧小平活了九十三年(1904-1997),但傅高義對鄧的評價,相當大程度基於他生命中的最後二十年,即由鄧主導的開放改革開始。這個選取相當配合作者的美國關懷,即鄧時代出現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因此,不能不讚賞中譯本的書名,它比原來英文版的書名更貼切,因為傅念茲在茲的是「鄧小平時代」,而不是「鄧小平」這個政治人物。傅對鄧最後二十年的偏重,令全書在篇幅安排上顯得極為不平衡。對於1904至1978年這七十餘年,此書花了不足200頁來敘述,餘下的僅僅二十年卻花了400頁篇幅。當然,不是說平均分配篇幅便是最好,但筆者不禁想問:傅以「開放改革」為中心的史觀,是否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角度,讓我們理解鄧的政治生涯以及中國的轉型呢?

要寫好歷史,當然要抓住重要的轉折,可是傅高義的歷史敘事只抓住了鄧小平的政治生涯中最顯眼的兩個地方,即鄧在文革時被打倒下放到江西當工人,以及1978年的開放改革。這顯然是因為傅以「開放改革」作為中心點來敘述,其他

鄧小平活了九十三年,但傅高義對鄧的評價,相當大程度基於他生命中的最後二十年,即由鄧主導的開放改革開始。這個選取相當配合作者的美國關懷,即鄧時代出現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

1954年，鄧的重要工作之一是調查高饒案，並於1955年作報告。鄧從此青雲直上。當然，這不單是一場高層辦公室政治鬥爭，而是中共在國家體制上確立一黨專政的開始。

同樣重要的轉折，都被他輕輕帶過，埋沒在缺乏分析的資料鋪陳之中，尤其忽略了1950年代鄧的掌權之路。

傅高義稱1969至1977年為鄧小平的「曲折的掌權之路」(頁45)。這容易讓人忽略了鄧在1969年前通向權力之路，也無法點出鄧的政治生涯特點，以及其與當代中國政治轉型的關係。雖然鄧在1930年代初便受到毛澤東的賞識，但成為中共中央領導人是始於1952年。當時有所謂「五馬進京」，即毛召集地方上五名大員成為中央人民政府的幹部。鄧進京前是西南局第一書記，入京後擔任多個中央職務，在短短幾年間，成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及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據不少黨史專家指出，其中最重要的轉折點，正是這期間發生的「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事件」。

高崗及饒漱石是「五馬」之二，分別來自東北及華東，原是毛澤東的忠實支持者，協助毛打擊劉少奇派系，包括負責財經的薄一波及負責人事組織的安子文。這場政治鬥爭的目的是要加速毛設想的社會主義過渡，拋棄「新民主主義」，即取消讓民主黨派共同執政，以及不再容許私營工商業發展。在這期間，高饒甚至打算籌劃另一份有別於安子文草擬的政治局及中央委員名單。可是，在1954年初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與毛暫時妥協了，高饒等成為代罪羔羊，最後兩人被打為「反黨集團」(林蘊暉：《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1953-195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9)，頁311-15)。此事的相關文件至今仍

為機密，在官方歷史中，高饒被描述成兩個莫名其妙的陰謀家，權欲薰心，陰謀奪權。官方黨史無法說清前因後果，於是把高崗的自殺視為「與黨對抗」，或「自絕於人民」。

不管如何，在這場政治鬥爭中，鄧小平扮演了重要角色。當鄧還不是政治局成員時，他已出席了1953年末相關的黨高層會議，狠批高饒。1954年，鄧的重要工作之一是調查高饒案，並於1955年作報告。鄧從此青雲直上。當然，這不單是一場高層辦公室政治鬥爭，而是中共在國家體制上確立一黨專政的開始。1954年《五四憲法》通過，取代了《共同綱領》；政協變成諮詢機構；民主黨派人士佔上一半的政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此後亦取消了。換言之，共同執政的政府消失了，新民主主義時期結束了，換成黨政合一。鄧在黨中央的掌權開始之日，正是中共從體制上確立一黨專政之始。

這個如此重要的過程在傳書中只有一段述及(頁36)，而且對其政治含義也沒有分析。不少鄧小平傳記頗為重視這段歷史的政治意義，例如，楊炳章用了一整章來談此事，點出了鄧如何在黨中央成為毛的忠實支持者(有趣的是，林彪與鄧同一時間進入政治局)；而古德曼也用了半章篇幅來談此事，他甚至指出，在1956年強調黨的「團結」口號之時，鄧開始在書記處與一些幹部結成政治上的盟友，他們在往後幾十年鄧的政治生涯中發揮重要作用。

抓不住這段歷史，便無法從政治經歷以至權力體制來掌握鄧小平這個人，並且容易誇大了鄧與毛的

分別，忽略了他倆共同為中共黨政一體奠下的基礎。事實上，鄧與毛的緊密關係，尤其是在1950年代，可以用來解釋傅高義所說的「鄧小平時代」的不少事情。例如，同樣被傅輕輕帶過的1957年反右運動，是在毛授權下由鄧直接執行的，最後把幾十萬知識份子打成右派，即鄧後來自詡的「擴大化」。一方面，反右終結了民主黨派及知識份子的獨立空間；另一方面，開始了由各級黨領導專政，針對所有反動階級進行鬥爭與改造的新體制。這個體制在所謂「鄧小平時代」固然褪去了階級鬥爭的色彩，但是黨領導專政以及壓制體制內外的言論及思想上的挑戰的做法，則是一脈相承的。這在日後鄧對待知識份子的做法上可以得到證實——西單民主牆運動的結局如是，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結局亦如是。

傅高義稱鄧小平為國家建造者與改革者，但他卻淡化了一點——鄧這個身份的前提，是他作為黨的建造者及守護者。鄧的富國強兵之路，更準確地說，是只能由黨國帶領的強國之路。因為這個盲點，作為鄧的傳記作者，傅亦沒有細緻去審視鄧延續了一個由毛開始的統治難題：既然黨要領導一切，那麼，它又如何保證接班人能持續保證黨的領導？對毛來說，是防止修正主義；對鄧來說，是防止改革溢出黨領導的框框，即他所說的「四項基本原則」中最重要的一項。

毛澤東當年搞的政治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嘗試解決這個傳承與接班的難題，可惜他總是愈搞問題愈大。先是高崗與劉少奇，後有林

彪；即使是「四人幫」治國，他也沒有信心。毛處處提防奪權者，卻把黨國機器弄得幾乎土崩瓦解，結果只剩下資歷淺與性格軟弱的華國鋒可以選擇；而華既與「四人幫」不合，亦注定要在毛逝世與「四人幫」倒台後被一眾老幹部所推倒。鄧小平雖然比毛年輕，但也是第一代中共黨人，當他上台時，他與身邊的幹部都是年過七十有餘，同樣立即面對傳承與接班人問題，因此不難理解為甚麼他急於讓趙紫陽及胡耀邦晉升。鄧雖然嘗試在較寬鬆的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進行接班與傳承，可是又怎能保證趙胡二人是合適的接班人？而且，文革後的中國充滿了思想啟蒙與解放氣氛，幾乎必然出現體制內的政治改革者。

雖然傅高義是美國人，但筆者並無意要求他以民主自由的標準去評價鄧小平，不過他至少應該從中共的政治改革路徑中去看鄧的成敗。1980年代可以說是鄧的「試錯階段」(trial by error)，不單在經濟改革上，在政治上也是「摸着石頭過河」，因此，他往往在政治改革派(或開明派)與保守派之間搖擺。在傅筆下，搖擺的結果是胡耀邦與趙紫陽都要下台，在六四後由江澤民接棒，然後漸漸順利過渡至集體領導。透過鄧的1992年南巡，中國繼續開放改革。很明顯，傅認為鄧是「試對了」。可是，這不是對與錯那樣簡單，胡與趙不同於江，1980年代的改革目標與議程，也跟1990年代以至今不同，當中很明顯的一點，就是為了維護黨的團結與領導，稍為觸及權力分配的政改也不再出現了，就連1980年代提出的黨

傅高義在書中大量引用吳國光的著作描述中共十三大前的政改爭論，可是政改在六四後的消失，對傅來說好像不是一件事情，更不是評價鄧的重點。這就如胡耀邦與趙紫陽在政壇消失，對中共都好像不是一回事一樣。

這本鄧小平傳記從一個美國學者的觀點出發，附和了中國六四後的強勢官方意識形態，是一個有趣的意識形態現象。這本書本身，以及大家對該書的關注，絕對可以作為研究「鄧小平現象」的重要一節。

政分開至今也沒有做到。簡言之，鄧要解決接班問題，卻犧牲了政治改革。

1980年代趙紫陽「政改」的參與者吳國光，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也發出同樣的慨嘆（吳國光：〈無法通過的窄門——中共政治回顧與思考〉，www.epochtimes.com/b5/7/10/15/n1867523.htm）。傅在書中大量引用吳的著作描述中共十三大前的政改爭論，可是政改在六四後的消失，對傅來說好像不是一件事情，更不是評價鄧的重點。這就如胡與趙在政壇消失，對中共都好像不是一回事一樣。難道傅忘記了，雖然鄧在生命最後的二十年裏，作為改革者取得了「成功」，保住了改革開放，但卻漠視了曾短暫出現過的眾多改革呼聲，以致斷送了推動政改的機會嗎？也許在傅眼中，八六學潮與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在政治上不夠成熟，提出的口號及訴求過於具有對抗性，那麼發自體制內的政改動力又如何呢？鄧並沒有找到平衡點，為了維持黨的絕對領導，他不只壓制了民間聲音，還扼殺了胡與趙等黨內改革者的訴求。政改的長期缺席、黨的集中領導，也成為往後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國模式」的基本政治條件。

鄧小平的政治生涯曲折與多變，當中個別事件涉及的政治與道德爭議，傅高義多採取一種不可知論，但又帶點犬儒與功利味道。例如，為人所詬病的有關六四的評價正是一例。傅同意，六四是個悲劇；但他又說，如果鄧在1989年不鎮壓北京民運，我們不知道將會發生甚麼。筆鋒一轉，他說，我們確

實知道，往後二十年中國取得社會穩定與經濟奇迹（頁570）。而且，他在沒有引述任何資料及文獻來源下，指出六四後「很多學生相信」及「很多人相信」，只有共產黨才能維持和促進經濟發展，比其他可能的選擇更可取（頁565-66）。這種論調，似乎是為了配合他對鄧採取的愛國主義與發展主義之評價：鄧畢竟完成了百年「富國強兵」之夢！

這種愛國論是對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簡化。事實上，歷史上極少中國知識份子只關心國家獨立與經濟增長，現代中國的政治爭議是極度激烈的。諷刺的是，這種粗糙的愛國主義，正是鄧小平在六四後所鼓吹的。傅在書中第二十二章「站穩腳跟：1989-1992」結尾更特別論及。正如他自己說，六四後中共的處境是「愛國主義、經濟發展和經濟機會的增加，共同構成了解決問題的手段」（頁591）。可惜，傅沒有反過來審視一下自己的作品，是否也沾染了「後六四」的中共意識形態色彩？

這本鄧小平傳記從一個美國學者的觀點出發，附和了中國六四後的強勢官方意識形態，即正如著名左翼歷史學者安德森（Perry R. Anderson）所說，是一種「中美觀點」（Sino-Americana）（Perry R. Anderson, “Sino-Americana”,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4, no. 3 [2012]: 20-22）。不過，這是一種中美強權也會感到舒服安心的觀點。這真是一個有趣的意識形態現象，筆者以為，《鄧小平時代》這本書本身，以及大家對該書的關注，絕對可以作為研究「鄧小平現象」的重要一節。